

编创丛书

他人集

他
人
集



他人集

本社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 编创丛书 •

他 人 集
本 社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25 字数：133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书号：10088·834 定价：0.87元

《编创丛书》总序

边春光

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编创丛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以提高广大出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为目的，可以促使出版工作者增加知识，扩大见闻，提高对书稿的鉴赏力，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编辑作风，促进出版事业沿着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

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和各项奋斗目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出版战线担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的书刊，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无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已越来越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也越来越被全党和全社会所认识。

改善和加强出版工作，有许多实际问题要解决，包括要切实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大力提高出

DM06/10

版物的质量；要统筹安排，制订出书规划和事业发展规划，出好重点书；要尽快改变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的落后状况，努力缩短出书周期，解决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等等。但是，为了适应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队伍，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严重任务。道理很简单，提高出版物质量，增加出版物的品种，就要有一支坚强的编辑队伍；使用先进的印刷设备，提高印刷技术水平，就要有一支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够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的职工队伍。有些印刷设备，我们一时制造不出来，还可以引进，但人才却不能靠引进，主要靠我们自己去培养。所以，要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我们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迅速采取各种切实措施，提高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政治理论水平、科学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以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需要。否则，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将会是一句空话。

“编创丛书”的出版，对广大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人员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无疑将会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我衷心期望把它办好，办成一个受广大出版工作者所欢迎的读物，真正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序

打开本书的目录，一个个熠熠闪光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蜚声中外的作家们的创作生涯以及他们脍炙人口的名作，早已为众多的读者所传诵。但是，他们在从事艰苦创作的同时，又是如何为繁荣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而在编辑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呢？这恐怕就很少为人所知了。本书着重叙述的，正是他们的编辑生涯，他们的高尚情操、严谨学风和献身精神。这就是本书之所以定名为《他人集》的原因。

通过书中一篇篇生动的文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些作家的编辑生活，更可以看到他们对真理坚贞不渝的追求，对事业火一般的热情，对读者和作者满腔热忱、高度负责的品德，从而受到教益，激励我们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而奋斗。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1 序

编 者

1 鲁迅的编辑生活

艾 斐

39 文学工作者和编辑工作者的楷模 ——怀念茅盾

安 塞

65 新闻出版工作的先驱——邹韬奋 刘景华

104 在编辑岗位上的郑振铎

佟家桓

124 叶圣陶与编辑工作

彭加瑾

149 他心中想的总是别人
——记巴金的编辑生涯

华水

172 忆靳以师

彭新琪

194 怀念良师魏金枝

艾以

208 作家——编辑
——孙犁印象记

管蠡

224 耕云播雨四十春
——韦君宜谈编辑

启治



鲁迅的编辑生活

艾 斐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不仅是著称于世的伟大文豪，而且是一位功绩卓著的编辑。

编辑工作——光荣的革命事业

鲁迅认为，编辑工作是光荣的工作，是革命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工作。所以，编辑工作者应当有一种光荣感，更应当有一种责任感。鲁迅一生，不仅主编和参加编辑过《越铎日报》、《新青年》、《语丝》、《奔流》、《莽原》、《萌芽》、《新地》、《文艺研究》、《世界文化》，

《译文》、《北新》等近三十种报刊，而且主办或参加开办过“未名社”、“朝花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等七个出版社。至于鲁迅直接间接支持过、或频或疏来往过的报刊，那就更多了，至少不下一百三十个。

一九一二年初，鲁迅在绍兴教书的时候，便积极参加了《越社丛刊》和《越铎日报》的编辑工作。同一个时期，他除承担《越社丛刊》（第一期）的编务（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加班编成的）外，还多方为《越铎日报》的经费、房子、稿件、编务等奔走和操心。这一切劳作，不但没有任何报酬，临末还因为给报社索取经费和在报纸上批评军政府的不径行为，而触怒了绍兴都督王金发，几乎招致杀身之祸。对此，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记述：“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杀死你们了。”鲁迅的母亲听了这个消息后，很为儿子的安全担心，劝儿子到外面去躲一躲。鲁迅却不以为然，照样在教书之余办他的报，并且多次出面和王金发进行交涉，力争报纸办下去，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鲁迅正式担任了《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事实上，在这以前

他已经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且以他的小说和杂文创作的实绩，很快被人誉为“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①。的确，鲁迅之所以不“安分守己”地在教育部里做他的“官”，而要不辞劳辛地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就是为了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因此，鲁迅在《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中，始终充满了战斗活力和首创精神。他不仅为刊物的组稿、编辑和印刷等奔走操劳，而且亲自动笔为刊物写了许多“震动”性的稿件。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五号起，到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九卷四号止，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小说五篇，新诗六首，随感录二十七篇，思想评论两篇，译文四篇，通讯三则，以及其他形式的文章，共五十篇，为刊物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利用在教育部供职的业余时间进行编辑和写作，而且写了这么多的好文章，不但不收受编辑工作的报酬，而且公开声明，对于所有的稿费，他分文不取。此外，鲁迅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始终不渝地为坚持革命的、正确的办刊方针而努力，而斗争。从一九一八年夏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仅仅一年的时间，鲁迅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如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力图复辟帝制的一

流，和林琴南、张厚载等力图抵制新文化运动的一流，打了两场“大仗”。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对其企图创办与《新青年》对垒交锋的、抵销《新青年》战斗力的杂志，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他说：“然即将刊之，且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②。他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写给其二弟的一封信中，公开声明《新青年》的任务，就是要彻底砸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使新文化运动的潮水鼓浪向前！在和封建复古派进行斗争的同时，鲁迅还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内部的右翼势力，进行了斗争。斗争的核心内容是：在《新青年》这块思想文化阵地上，是宣传“改良”呢，还是宣传“革命”？是宣传反动的“实验主义”呢，还是宣传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坚决主张后者，与胡适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戳穿胡适妄图改变《新青年》编辑方针、篡改《新青年》性质的阴谋，有力地保卫了《新青年》的革命性和战斗力。

象在《越铎日报》、《新青年》编辑工作中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几乎遍及鲁迅所编辑过的全部刊物。而且愈到后来，困难愈多，阻力愈大，斗争愈烈，代价愈昂。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做进步报刊的编辑工作，是要冒毁

誉甚至掉脑袋的风险的。鲁迅仅仅因为在他主编的《语丝》杂志上，登了一篇揭发复旦大学黑暗内幕的稿子，就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诬为“堕落文人”，并密令通缉。和鲁迅一起办《朝花周刊》的柔石被捕，并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后，鲁迅的名字也被列入了特务的黑名单，常常被盯梢和跟踪，几乎随时都会遭到不测。那时候，只要在一本杂志上“检查”出红颜色的封面，锤子镰刀的图案，“苏联”、“阶级”、“唯物论”一类的字眼，都是可以向编辑者问罪的，更不用说文章内容上所带的“左”的色彩了。真是文网辄罹，动招罪尤，“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③。正如鲁迅所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④

但是，在鲁迅看来，编辑工作既然是一种革命事业，编辑者就不应顾及这一切，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冒多大的风险，也要把工作做好。许广平在回忆鲁迅和冯雪峰一起编辑第五期以后的《文学导报》和一九三一年底出版的左联刊物《十字街头》的情况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雪峰“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十时才能回家，……回来饭后已十一时了。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

是他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走出去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预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很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⑤可见鲁迅在编辑刊物时所付出的辛劳之巨和心血之丹了。

不仅如此，鲁迅帮助别人办刊物，同样倾注了满腔心血。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从头到尾得到鲁迅的关心和支持，连“太白”这个刊名，也是鲁迅颇费了一番思索给起的。“太白”者，“启明星”也。他用“太白”预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左联的机关刊物《巴尔底山》创刊前后，鲁迅虽非该刊编辑，却不吝帮助和指导。当然，鲁迅对别人所编的刊物的关怀和支持，并不仅仅局限于做一些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他更多地关注的，倒是对刊物的方向、编辑的作风等方面的指导，甚至批评。如对一九二四年创刊于北京的《妇女周刊》的编辑作风，尤其是主编欧阳兰的作风，鲁迅就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因为身为杂志主编的欧阳兰，竟然抄袭日本菊池宽的《父归》，而写了独幕剧《父亲的归来》；还抄袭郭沫若所翻译的雪莱的诗，诡称是她自己所创作。尤其是当这种卑劣的抄袭行为被人揭发后，欧阳兰不但不认

错，反而还用“绿信纸”写了一些狡辩的文章，署以“琴心”女士、“雪纹”女士之名，装在“红信封”里寄给《京报副刊》，以迷惑编辑，误以为新出了一位女作家替欧阳兰辩护，遂将文章登出。鲁迅对此劣行十分愤慨，他说：“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直到次年（1925年），鲁迅在四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日和四月二十三日，分别写给许广平、钱玄同、向培良等人的信中，以及在《华盖集·忽然想到（5）》中，还屡屡批评了欧阳兰的文痞作风，并论及其对具有进步倾向的《妇女周刊》杂志的不良影响，忧愤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自己所编辑的书刊，那要求就更高、更严格了，在各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也更大。鲁迅在编辑《未名丛刊》时，编辑部成员共六人，五位青年（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每人各出资五十元，他一人则出资四百六十六元，并且对自己的文稿从不提取稿费。在编辑《朝花周刊》、《艺苑朝华》和《朝花旬丛》时，编辑共五个人（鲁迅、柔石、崔真吾、王方仁、许广平），只有王方仁和崔真吾各认了一股，其余三股，全由鲁迅一人包了下来。在以“三闲书屋”名义编辑出版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和《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死魂灵百图》等书、画时，则干脆由鲁迅一人出资自费印行。除了无偿出资，就是无偿出力。自己编辑，自己校对，自己设计封面和装帧，自己联系印刷事宜——这是鲁迅的一贯作风。他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中说过：“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有些浸泡着鲁迅的心血和汗水的书刊出世未久，甚至尚未出世，就被或查禁，或没收，或毁版，有的甚至还惹来了杀身之祸，鲁迅的心简直就象渍在盐水里一样的痉挛、疼痛，但他却从不懊悔，只是干！

从一九〇七年弃医从文，在日本筹办《新生》杂志（未成），到一九三六年逝世前不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辑出版并自费精印瞿秋白的《海上述林》——鲁迅在其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间断过编辑工作。谁能计算出这位伟大的革命文豪在编辑工作中慷慨地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呢？！

对读者和作者都要高度负责

鲁迅认为，编辑工作既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也要对作者负责。

鲁迅对编辑工作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真是到了惊人的程度。正如他自己在谈及《未名

丛刊》的编辑出版情况时所说：“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书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⑥这就是说，鲁迅编辑书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自己赚钱。后来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还专门对“未名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⑦仅仅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十年间，鲁迅就为别人纂辑、校勘、校订、校对及编辑了七十多部（卷）书稿（与此同时，他自己还完成了三十来部译著），编辑的刊物也有七、八种。从这个工作量中完全可以想象出来，鲁迅是在怎样“拼命”进行工作的。他在回顾这十年岁月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⑧

鲁迅终生都不曾超脱过做具体、实际而琐碎的编辑事务，而自己编辑的书刊每每又总是自己